

# 齊如山藏書聚散考略

羅景文

## 摘要

齊如山（1875-1962）舊藏小說戲曲古籍現今流散四方，其中又以中國國家圖書館（原北京圖書館）和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兩者典藏最多。由於未有研究者針對齊如山藏書的聚散情形，以及藏書去向之諸說多作說明。因此，本文試圖先勾勒出齊如山及齊家藏書數度聚散的軌跡、平日訪書和蒐求文獻的管道與概況，以及對北京舊書業的紀錄。接著，討論關於齊氏藏書去向的諸種說法，釐清其中的矛盾和異同。這樣的討論當有助於彌補學界對齊如山藏書活動得以有更深入的了解。

## 一、前言

齊如山（1875-1962），名宗康，以字行，河北高陽人。他不僅是當代重要的京劇理論家和作家，也是著名的小說、戲曲藏書家，其書齋名曰「百舍齋」<sup>[1]</sup>，他

---

**關鍵詞 (Keywords)：**齊如山；百舍齋；藏書家；小說戲曲；藏書聚散

Qi Rushan；Bai She Zhai；Book Collector；Fictions and Operas；Gathering-scattering of Book Collection

羅景文：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生；E-mail: jingwen123@pchome.com.tw

[1] 齊如山曾云：「先嚴業師武昌張廉卿名裕釗，曾為舍下書一齋額曰『百舍齋』，故即以此名之，以志不忘先澤也。」見：《齊如山回憶錄》，《齊如山全集》第10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12），頁236（總頁6250）。

所庋藏的小說、戲曲古籍便各有四百種左右。他之所以能撰成《小說勾陳》、《齊氏百舍齋存戲曲目錄》以及《齊氏百舍齋收藏小說目錄》等小說戲曲目錄或題跋，都是奠基於他那豐富的小說戲曲藏書。然而，時局的動盪不安使得齊氏於1948年年底離開中國大陸，倉促之間，他僅能攜帶部分較為精善的藏書抵臺，這些古籍後來入藏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以下簡稱「燕圖」），至於大部分留在北京的藏書則逐漸散出。由於政治和相關目錄、資料散佚等因素的干擾，使得學界對於齊如山及齊家藏書的聚散情形，以及藏書之去向不甚了解，雖然陸續有研究者討論這個問題，但由於種種因素的限制，尙未能較為全面地探討齊如山及齊家訪書、得書和藏書的經過和管道，及其藏書散逸、流傳，以及入藏公共或大學圖書館之過程。<sup>[2]</sup>

有鑑於此，本文試圖先從齊如山的著作中鉤輯相關線索，藉以說明齊如山及齊家藏書數度聚散的軌跡；其次，是勾勒出齊如山平素訪書、蒐求文獻的概況，以及他與書賈往來和對北京舊書業的紀錄；接著，釐清關於齊氏藏書流散中國與美國各種說法；最後為結論。

## 二、齊家與齊如山藏書的聚散過程

私家藏書往往聚散無常，所以明末清初大儒黃宗羲（1610-1695）曾發出：

- <sup>[2]</sup> 1. 吳曉鈴，〈哈佛大學所藏高陽齊氏百舍齋善本小說跋尾〉，《明清小說論叢》，1（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4.5），頁289-320。吳氏輯錄燕京圖書館所藏齊氏舊藏的二十三種小說題跋，並提及齊如山藏書在中國的流散狀況。此外，他於文中又云：「齊氏舊藏小說之歸哈佛者尚多，暇當勒為一目，供國人治斯學者為考索之資」，頁290，但後來並未成文。
2. 沈津，〈齊如山的百舍齋藏書〉，載於：氏著，《書城風弦錄——沈津讀書筆記》（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10），頁201-204。此文介紹燕京圖書館所藏七十二種齊氏舊藏小說戲曲書籍的特色，以及齊氏藏書入藏燕京圖書館的過程，較吳氏〈跋尾〉更進一步說明齊氏藏書在燕圖的概況，並著錄較為稀見珍罕之小說戲曲之書名。
3. 張守謙，〈通俗小說提要知見錄〉，《明清小說研究》，6（1987.12），頁530。此文亦提及齊如山藏書在中國的流散情形。
4. 大塚秀高，《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東京：汲古書院，1987.5）。此書在著錄小說的各種版本時，詳細記錄小說過去的舊藏者，其中便有關於齊如山舊藏小說在美國和中國的一些蹤跡。
5. 羅景文，「齊如山〈小說勾陳〉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4），〈附錄一、齊氏舊藏小說、戲曲書籍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的典藏概況〉，頁207-216；〈附錄二、齊氏舊藏古籍、著作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及其他圖書館的典藏概況〉，頁217-227。此二文雖已大致整理出齊如山舊藏小說戲曲在美國及中國的典藏狀況，但仍未探討齊如山及齊家藏書聚散，以及入藏公共或大學圖書館之過程和諸種說法。

「嘗嘆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的喟嘆。<sup>[3]</sup>齊家藏書由其先祖奠基，經過累世經營，而在齊如山的銳意購藏之下終成大觀，並形成小說戲曲藏書的特色。不過，齊家以及齊如山的藏書屢遭書厄，甚至到最後是星散四方，其藏書聚散的過程為何，是本文考察的重點。

在齊如山的藏書上往往有一枚篆體藏章：「齊林玉世世子孫永寶用」，這不僅是鑑別齊氏藏書的依據之一<sup>[4]</sup>，也傳達出齊如山與齊家對於古籍圖書的珍愛，以及藏書傳世永保的願望。齊家原為務農之家，素無藏書，其藏書始自齊林玉（字國琳，生卒不詳）。他是齊如山的九世祖，明末清初人，曾「與河北省新城縣王餘佑（五公山人）、蠡鵬李恕谷（堪）、博野縣顏習齋（元）諸公都是莫逆交」。<sup>[5]</sup>他受到顏、李二人的鼓勵，便購置大量圖書，奠定齊家藏書的基礎。後來經過齊如山之高祖齊乘禮（字治魯，生卒不詳）、曾祖齊正訓（字竹溪，生卒不詳）等人的經營，已頗有可觀之數。但從此之後，齊家藏書便屢遭書厄，開始了聚散無定的命運。

根據齊如山的回憶，齊家藏書第一次遭厄是在捻軍起事時，「不幸遭捻匪張總愚，外號小閻王子之亂，舍下樓舍被焚，書毀了十分之八」。<sup>[6]</sup>此時中國正面臨嚴重的內部問題，南有太平軍，而北則有捻軍，兩股勢力時而合流，時而分擊，使清政府疲於奔命，重創國計民生。但無論是太平軍還是捻軍，私家藏書都不能倖免於難。對此，陳登原（1900-1974）曾云：<sup>[7]</sup>

清師奠定中國之後，唯一之大兵燹，當推洪楊之亂，則述浙東天一閣之受劫，而天一閣之史實附焉。其與洪楊同時，在北方則有捻寇，因附楊氏海源閣之遭劫，而海源閣之史實附焉。其在南方若汪氏振綺堂、孫氏壽松堂，以及江浙之四庫三閣，均同時受創者也，則並壽松堂等藏書之大概附焉。他如

[3] 黃宗羲，《南雷文定》卷二（臺北：臺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1.6，四部備要本），第1葉A面。

[4] 尚有「高陽齊氏百舍齋存書之印」朱方，「齊氏所藏戲曲小說印」白方，「如山過目」白方、「如山讀過」白方、「齊如山」白方、「高陽齊氏」白方等藏章。

[5] 同註1，頁2（總頁6016）。

[6] 齊如山，〈百舍齋存戲曲書目·百舍齋所藏戲曲存書目序〉，《齊如山全集》第4冊，頁2（總頁2590）。

[7] 陳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1），頁20。此外，關於太平軍與捻軍對於各地藏書家的重創亦可參見：范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7），頁477-481；徐雁，《中國舊書業百年》（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5），頁347-360。

瞿氏鐵琴銅劍樓、朱氏開有益齋等等，因與此兵燹有關，亦附見之。

全國重要的藏書樓大都遭劫，齊家藏書同樣在此次戰亂中損失慘重，後由齊如山的父親——齊令辰（號禊亭）恢復一部分藏書，後因就館於李鴻藻（1819-1897）家，教授李石曾（1881-1973），所以將其藏書存於北京李家。<sup>[8]</sup>好不容易復原的藏書卻因庚子拳亂再次遭劫，這是齊家藏書第二次遭毀。而北京其他私家藏書同樣遭劫<sup>[9]</sup>，此時古籍大量散出。近代藏書家倫明（1875-1944）曾云：「壬寅（1902年）初至京師，值庚子亂後，王府貴家儲書大出，余日游海王村、隆福寺間，目不暇給，每暮必載書滿車回寓。」<sup>[10]</sup>

正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庚子拳亂雖然讓齊家損失部分藏書，但也因為古籍大量散出，讓齊如山如同倫明一樣購得不少圖書：<sup>[11]</sup>

庚子年，北平商號全數被搶，只書鋪有倖免者，被搶之物，即在大街擺攤售賣，價極便宜，舊書一項更是毫無買主，只若肯買，則等於白拾，但因係搶得之物，故多殘缺，大部頭書，完整者尤少，所以特別便宜。例如我買過一部王先謙的《續經解》，才合現大洋三元，餘可類推，因此又收購了若干，小說戲曲尤多，至此舍下藏書的宗旨總算又恢復一部份。

從倫明和齊如山的紀錄可知，這些散出的古籍可能是來自於賊民的劫掠，或是世家大族與藏書家迫於時局動盪而拋售舊物、變賣圖書。但無論如何，在這些大量古籍散出的背後，是更多的不計其數的古籍的損失。

不過，中國的書厄並未就此結束，日人侵華與抗日戰爭帶給公私藏書莫大的損失。<sup>[12]</sup>在日軍佔北京之後，由於局勢動盪不安，古籍舊槧又大量散出，齊

[8] 同註 6。關於李石曾與高陽齊家之間的交往情形，詳見：賀寶善，〈李石曾與高陽齊家〉一文，收入：氏著，《思齊閣憶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10），頁 10-15。值得注意的是，此文提到：「（齊氏）書齋開始在李府西院小書房，後推廣至西院以至前院全部，雖是家塾，幾乎成爲一座書院與圖書館，性質類似法國的文藝沙龍與政治沙龍」，頁 11。由此亦可窺見齊禊亭訪書之勤和庋藏之豐。

[9] 徐雁，《中國舊書業百年》，頁 363-366。

[10] 倫明，〈續書樓藏書記〉，收入：倫明著、雷夢水校，《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9），頁 124。

[11] 同註 6。

[12] 李雪梅曾云：「從 1931 年東北淪陷，至 1945 抗戰勝利，戰火瀰漫中國達數十年之久。尤其是日軍在戰爭中使用了最現代化的武器，使許多公私收藏被損毀時片紙無存。這不僅僅是中國近代藏書史上的厄運，更是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一大災難。」見：氏著，《中國近代藏書文化》（北京：現代出版社，1999.1），頁 330。

如山提到：<sup>[13]</sup>

迨至七七事變，日寇佔據北平之後，人民無事可作，無法生活，便有許多人人家，把舊藏的物器出售，這個時候，出現的舊書很多，舊書鋪收買到手，因生意蕭條，也無力久存，也只好賤價出售，於是我又收得了一大部分，且有許多不易見到之書，這次算是舍下收書最多的一次。

齊如山舊書未受到日軍侵華戰爭的波及而損毀散失，反而因為書價低廉，購集圖書甚豐，其中多有罕見之本。而這段紀錄也忠實的呈現戰爭爆發與物價乃至於書價的關係，這是個「人與古書同遭劫難的時期」。<sup>[14]</sup>抗日戰後結束不久之後，國共內戰遂起，齊如山於1948年年底離開中國大陸，移居臺灣，隨身僅攜帶少量藏書。齊家藏書兩次因戰亂受創損毀，又因時局的動盪不定讓他離開北京，離開齊家累世收藏和他精心蒐集的古籍。他曾掛念著這批藏書，他說：「舍下之存書，經過兩次極大的損失，此次在北平所存之書，將來結果如何？實不敢說」。<sup>[15]</sup>最後，這些隨著他抵臺的藏書日後入藏燕圖，而大部分留在北京的藏書則受到政治因素和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逐漸散佚，下文將釐清齊氏藏書在中國和美國的去向之諸種說法。

由於家藏書籍屢屢遭劫，齊如山在「民國三十四年，忽然想起從前所存之書，經兩次兵燹，幾乎完全損失，後來不但不能見其書，且連書名都不能知道，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乃決定把全書編一目錄」<sup>[16]</sup>，齊氏鑒於家中藏書旋聚旋散，因此編寫目錄以存書目，若他日藏書散佚遭劫，書雖去而目仍存，此自是保存舊籍之功。又因齊氏家中藏書空間不足，而將經史各部門書籍存於親戚家中，小說、戲曲則全數存於家中，故先編成小說和戲曲兩種目錄，遂有《齊氏百舍齋收藏小說目錄》與《齊氏百舍齋收存戲曲目錄》二目。

[13] 同註 6。

[14] 關於抗日戰爭與書價的關係，任中奇曾云：「抗戰一開始，社會陷入混亂，人心惶惶無心買書，書不值錢，鄭振鐸《劫中得書記》說當時書店收市，有就地擺攤給錢就行的，有挑擔沿街叫賣的，這真是人和古書同遭劫難的時期。後來稍稍安定一些，公、私藏書經過戰亂散出，陸續上市，書價也逐步回升。」見：氏著，〈古書價格漫談〉，《藏書家》，2（2000.6），頁 128。而鄭振鐸在《劫中得書記·序》提到：「而諸肆亦皆作結束計，無書應市。通衢之間，殘書布地，不擇價而售。亦有以雙籃盛書，肩挑而趨，沿街叫賣者」，此文收入：氏著，《西諦書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5，2版），頁 208。

[15] 同註 6，頁 4（總頁 2592）。

[16] 同註 6，頁 3（總頁 2591）。

藏書困難散書易，這是許多藏書家共同的體會，他們不得不面對藏書聚散的歷史命運與規律，陳登原曾歸納出典籍聚散的四個原因：獨夫之專斷（政治）、人事之不臧（人事）、兵匪之擾亂（兵燹）、藏弄者之鮮克有終（藏弄）等四項，此可謂書之「四厄」。<sup>[17]</sup>綜觀齊氏藏書之聚散主要肇因於政治與兵燹二項，其藏書數十年之間旋散旋聚，卻又旋聚旋散，其間的變化不可謂不大矣。而他對於藏書聚散的忠實紀錄，也具體地反映百年以來中國藏書聚散的歷史軌跡。

### 三、齊如山的訪書活動及其對於北京舊書業的紀錄

大凡藏書家都有訪書，或是逛冷攤書肆的習慣，甚至成爲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齊如山對於其訪書的概況和蒐羅文獻的管道，以及其對北京舊書業的紀錄，除了上文所引述的資料之外，尙可見於《齊如山回憶錄》第八章「創立國劇學會·蒐羅國劇的材料」一節<sup>[18]</sup>，以及《中國風俗叢談·書鋪》<sup>[19]</sup>、《北平·舊書鋪》<sup>[20]</sup>二文。

齊如山回憶過去成立國劇學會時，其中一項重要的工作便是蒐集訪求戲劇曲藝的文獻材料，以做爲國劇學會日後展覽、研究的基礎。他蒐求尋訪的管道主要有四：<sup>[21]</sup>

一到戲界各公共場所去蒐求，二到各梨園世家家中去蒐求，三是到清宮中去蒐求，四是在市面及街上小攤各處留神。

齊如山所謂的「公共場所」即是北京精忠廟、昇平署太監之墓塋，以及梨園或各大戲班的公墓等處，他訪得戲班的人員名冊，並從墓誌碑文上抄錄不少與戲劇有關的資料。他亦從梨園世家家中蒐求劇本，不過，他提到戲界學戲多爲師徒之間口傳心授，少有劇本，即使有劇本，也只是個別演員演出時的「單本」。因此，他便向保留較多劇本的戲班或笛師商借，抄錄了幾百種篇幅較長的劇本。除了劇本之外，他也得到不少關於戲班服裝道具的「行頭單子」，以

[17] 同註 7，頁 16。

[18] 同註 1，頁 154-168（總頁 6168-6182）。此點承蒙審查委員告知，謹此致謝。

[19] 齊如山，《中國風俗叢談·書鋪》，《齊如山全集》第 9 冊，頁 67-69（總頁 4815-4817）。

[20] 齊如山，《北平·舊書鋪》，《齊如山全集》第 10 冊，頁 72-73（總頁 5960-5961）。

[21] 同註 1，頁 154-155（總頁 6168-6169）。

及演員搭班演出的日記。他更透過關係從清宮昇平署中購得八百多本劇本，並為南京國立編譯館購買了一百多種。而清宮內務府衙門中與戲劇有關的檔案文書，則是在齊如山的搶救之下，得以從還魂紙廠的化漿池中倖存一二。齊如山也提到市面及街上小攤，是他蒐羅戲曲文獻材料極重要的地方，所以尋訪甚勤。他得到不少戲班人員名冊、演出提綱、劇本、宮中文書檔案，以及臉譜圖冊和與戲劇有關之年畫，甚至是數百件樂器及其他物件。<sup>[22]</sup>這都是考察戲界制度及其變遷的重要史料。從齊如山蒐集文獻史料的方式與途徑，我們可以體會到前輩學人治學的嚴謹態度，正如傅斯年（1896-1950）的名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他自己也說：「研究無論任何學問，也不能離開社會的實在情形，倘若不管真的實事，而只知研究書本的記載，那總是近於空虛的學問，所以我對此特別注意。」<sup>[23]</sup>既不以書籍為限，又能關注到書籍之外的第一手資料，不因史料零碎而棄之不顧，這種勤於蒐集，企圖充分掌握文獻資料的態度，值得研究者省思、學習。

齊如山在蒐集與整理通俗文藝的史料文獻的過程中，也觀察到社會和學術界對收藏和研究通俗文藝之風氣的轉變，他說：<sup>[24]</sup>

在民國十年以前，我所想蒐購的東西，正式的書店尚未注意，就是給他們送上門去，他們也不想。到民國十幾年以後，順治門裡頭的小書鋪，及東安市場中的書鋪，才收買這些東西，像琉璃廠及隆福寺的大書鋪，仍不要，到了民國二十年各大書鋪才有收賣的，所以彼時蒐羅這些東西，非在各街道小攤上尋找不可。

通俗文藝如小說、戲曲這類不登大雅之堂的作品，往往不為藏書家和學者所重。因此，通俗文藝研究者在一開始就必須面對文獻史料缺乏的窘境，令人頗感無奈。<sup>[25]</sup>爾後，在西風東漸的風潮帶動，以及有識之士的提倡之下，世人與學者逐漸了解通俗文藝的性質與社會作用。經由多位學者的蒐集、整理與研

[22] 同註 1，頁 155-168（總頁 6168-6182）。

[23] 同註 1，頁 285（總頁 6299）。

[24] 同註 1，頁 162（總頁 6176）。

[25] 這種情形亦如鄭振鐸在《劫中得書記·新序》中所云：「在三十多年前，除了少數人之外，誰還注意到小說、戲曲的書呢？這一類『不登大雅之堂』的古書，在圖書館裡是不大有的。我不得不自己去蒐訪。至於彈詞、寶卷、大鼓詞和明清版的插圖書之類，更是曲『低』和寡，非自己買便不能從任何地方借到的了。」鄭氏此序作於 1956 年 8 月。同註 14，頁 204。

究，通俗文藝的地位才普遍受到肯定，各大書肆也開始收購販賣各種與通俗文藝有關之文物史料。這段文字不僅記錄了北京舊書業對於通俗文藝蒐購販售的轉變歷程，也說明了齊如山早在社會和學界重視通俗文藝的風氣之前，已經將目光關注到通俗文藝史料文獻的蒐集與整理。

然而，令人感到遺憾的是，齊如山戮力蒐藏的文獻器物如今都已星散四方，我們無從得見。所幸，齊如山在蒐集這些文獻史料之後，加以分類整理，將史料檔案器物載錄於《北平國劇學會陳列館目錄》二卷之中<sup>[26]</sup>，而各戲劇本以及曲學著作則由傅惜華（1907-1970）著錄於《北平國劇學會圖書館書目》三卷之中。<sup>[27]</sup>齊氏透過目錄將自己勤苦蒐集的資料介紹於世，公諸同好，除了保存舊籍之外，這種秘不私藏的著錄態度，更具流傳之功，有助於學術文化的進展。這一點，亦可從齊氏對已藏戲曲文獻的開放態度，窺見一斑：<sup>[28]</sup>

我們收買這些劇本，不只為的收藏，也要供諸實用。因為戲界人本子永遠秘密，不肯借與人，以致有許多好戲早已失傳，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我們所有的本子，誰想照鈔都可，絕對不要報酬，雖鈔出去出賣，我們也不管，因為他賣也是流傳也。

齊氏身為藏書家，既肯將關注的眼光投注於通俗文藝的收藏上，又深知學術為天下公器，文化為眾人所共用的道理，這種對文獻資料秘不私藏，採取開放、分享的態度是值得肯定的。這些新材料的公開，尤其在通俗文藝之文獻尚且匱乏，而許多學者仍在勤苦蒐集、整理的時代中，有其特殊的價值與意義。這些目錄也有助於學術界了解齊氏藏書的內容與概況，能更準確地估量其藏書的價值。正因這批史料文物散佚不全，所以更突顯了這些目錄書目的重要性。

<sup>[26]</sup> 詳見：齊如山編纂，《北平國劇學會陳列館目錄》（北平：北平國劇學會，1935.6）。齊如山將相關的戲曲文獻史料分為四類：1. 內務府檔案；2. 昇平署劇本文物；3. 普通戲班文物；4. 圖表、相片、樂器、唱片等四類。見：該書「凡例」，頁1。此點承蒙審查委員告知，謹此致謝。

<sup>[27]</sup> 詳見：傅惜華編纂，《北平國劇學會圖書館書目》（北平：北平國劇學會，1935.4）。《齊如山全集》第5冊亦有收錄，唯未注明出版訊息，見總頁3177-3304。此目分為三卷，「上卷著錄者，自元代迄於清末之南北曲目錄，中卷係近代各省流行之俗劇目錄。下卷所數則為音樂、韻學、影書、彈詞、小調五門，原關聯戲劇頗重，類皆必需參考之籍，故以為殿焉。話劇期刊二類，亦暫屬之。」見：書前「例言」，頁5。傅氏在著錄各類戲劇曲學書籍時，也記錄了各書的藏書者，其中又以齊如山、傅惜華和梅蘭芳三人所藏最多。藉此亦可窺見傅、梅二氏藏書之一斑。

<sup>[28]</sup> 同註1，頁223（總頁6237）。

而齊氏對於北京舊書肆經營形態和策略的紀錄，則可見於《中國風俗叢談·書鋪》和《北平·舊書鋪》二文。二者內容雖然差異不大，但互有詳略。齊如山提到：<sup>[29]</sup>

舊書鋪中，都有一兩間屋子，擺著十張八張棹子，又像客廳的茶座，又像飯館中的飯座，文人可以隨便進去坐下看書，總有幾個徒弟在旁邊伺候，想看什麼書，告訴他，他便可以取來，如欲參考版本，他可以把此書之不同版本，全數取來，任客人查對。

除此之外，齊氏也說到舊書肆發揮現今圖書館「館際合作」的功能，可以透過人際關係以及商業網絡，代為向其它有書的書肆或學者借閱圖書，供顧客參考，而此舉無須任何費用，為文人學者閱讀、研究提供極大的便利。不僅如此，書肆還提供代買或是招待點心、飲食的服務。這些服務都是當時公共圖書館所無法提供的功能，無怪乎齊如山認為舊書肆對於學者文人研究學問「比圖書館還方便」，這自然是舊書肆吸引文人學者流連忘返的主要原因之一。<sup>[30]</sup>

舊書肆如此便利的服務會讓齊如山感到疑惑，「老光看不買豈不陪錢」，但他詢問過舊書肆主人之後認為：<sup>[31]</sup>

這種舊書鋪之掌櫃，不但有道德，而且有思想，他說書鋪的買賣，道路最窄，平常人不但買，而且不看。所來往的，只有幾個文人，文人多無錢，也應該幫幫他們的忙，而且常看總有買的時候，倘他給介紹一個朋友，作一批大點的買賣，也是往往有的事情，這那能說是他白看呢？請聽他這話，是多麼有道德。

這些舊書肆主人不會因為讀者顧客白看書不買，或是光借不買，而與之結怨齟齬，反而提供更多的優惠和協助，依然和顏悅色，這種方便讀者的態度自然得到士人學者的讚許，雖然這也是招攬顧客、留住客源的經營策略之一，但更具有人情味以及大賈風範，「誰謂商盡以利為事耶」。<sup>[32]</sup>而書肆主人日與書親，並多與士人學者交遊往來，亦帶有幾分儒雅的書卷氣。

[29] 同註 19，頁 68（總頁 4816）。

[30] 同註 12，頁 290-291。

[31] 同註 20，頁 73（總頁 5961）。

[32] 倫明，《叢書目錄拾遺·序》，載於：孫殿起錄，《叢書目錄拾遺》（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2），頁 2。

身為舊書肆主人最重要的便是鑑別版本、掌握文獻與目錄的能力，其中最為人所知的代表人物莫過於通學齋主人——孫殿起（字耀卿，1894-1958）。而齊如山則是提到另一位同樣對於文獻學、目錄學有精深研究的舊書肆主人，即琉璃廠翰文齋主人韓俊華（?-1895）<sup>[33]</sup>，他說：<sup>[34]</sup>

張之洞常說，讀書人應該多往書鋪裡去，至少於目錄之學，是有絕大益處的，蓋書鋪中不但書多，而書鋪中之掌櫃的，對於目錄學，都是很有研究的，如琉璃廠路南，翰文齋之老掌櫃的姓韓，人稱韓先生，或曰老韓，目錄學便很精湛，與舒鐵雲、王懿榮諸君，都很有交情，常常彼此質疑，從前張之洞、王懿榮、潘祖蔭諸公，作京官時，都是常到書鋪去看書的，尤其翰林院諸君，有許多出了院，就到書鋪去，一則看書，二則許多朋友可以談談天，借以研究學問，比坐在家中看書好的多。

文人學者到舊書肆訪書，不僅可以從舊書肆主人的經驗談中得到文獻學和鑑別版本的知識，以增廣見聞，更可以在舊書肆這個文化沙龍（Salon）裡結交書友，與其他有志一同的士人談論學術、辯論問題、交流資訊。舊書肆並非只是販賣圖書舊籍的商業場所，除了絕佳的服務、書肆主人的儒商風範和精深的文獻知識之外，其中文化氣息和社交活動更是密不可分地交織在一起，形成一種文化沙龍的氛圍，使舊書肆成為交流傳遞訊息，以及分享文化品味的中心，吸引文人學者駐足流連、徜徉其間。<sup>[35]</sup>

而齊如山又曾在那些書肆購書，或是與那些書肆相往來呢？雖然齊氏在其著作中並未留下詳細的紀錄，或是實際購書的書目清單，但仍有些蛛絲馬跡可供鉤輯。齊氏曾提到：「從前先嚴便常常因為作文章，家中參考書不夠，便向書鋪去借，因為與二酉齋、經香閣、翰文齋等等書鋪都很熟，屆時便給送來，每次多至十部八部，他也不會報（筆者按：抱）怨。」<sup>[36]</sup>這一段話雖然是齊如

<sup>[33]</sup> 孫殿起記翰文齋云：「韓俊華，字星垣，衡水縣人，於光緒十二年開設。……二十一年俊華子林蔚繼其業，已經營五十餘年」。見：孫殿起輯，《琉璃廠小志·琉璃廠書肆三記》（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9月），頁116。翰文齋第二代主人韓林蔚（1878-1962）亦精於版本目錄之學。翰文齋的發展歷史參見：胡金兆，《百年琉璃廠》（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8），頁22-27。

<sup>[34]</sup> 同註19，頁68-69（總頁4816-4817）。

<sup>[35]</sup> 關於北京舊書肆的經營形態與文化貢獻亦可參見：瞿蛻園《北遊錄話》，載於：孫殿起輯，《琉璃廠小志》，頁14-15。

<sup>[36]</sup> 同註19，頁68（總頁4816）。

山回憶他的父親齊楔亭與二酉齋<sup>[37]</sup>、經香閣<sup>[38]</sup>、翰文齋等舊書肆密切往來的情形，但他並未提到他自己與這些書肆往來的情況，不過相信他與這些舊書肆的關係應不生疏才是，尤其是他在文中數度提及的「翰文齋」。而目前典藏於燕圖的齊如山舊藏《縮春園傳奇》一書，則提供了此書流落舊書肆，以及齊如山購書的線索，對此，沈津曾云：<sup>[39]</sup>

王（孝慈）是1936年2月逝去的，年僅五十三歲。王氏故去後，遺書散出，《十竹齋箋譜》歸之北平圖書館，其他的則賣給了舊書店。在《縮春園傳奇》裏另夾有一小條，上寫「螭麟齋抄本縮春園傳奇。一函。五百元。文友堂。」當是王孝慈書散，文友堂得到了不少，其中有些又售與齊如山者。

據《最近官紳履歷彙錄》一書可知，王立承（字孝慈，1936-1936），河北通縣人，監生。廣西法政學堂畢業，曾任度支部主事、檢查紙幣清理財政處幫辦、大總統府秘書、政事堂機要局僉事，國務院秘書廳的僉事，並獲五等嘉禾獎章。<sup>[40]</sup>王立承亦為版畫、戲曲書籍收藏者，曾藏有明崇禎十七年（1644）刊《十竹齋箋譜》，後借魯迅、鄭振鐸編輯《北平箋譜》時翻印出版。<sup>[41]</sup>而這部《縮春園傳奇》便是他的藏書之一。從書中夾簽的紀錄可知王氏死後，藏書散出，此書流落文友堂，後為齊如山所購得，書價約在五百元上下。<sup>[42]</sup>由此可

<sup>[37]</sup> 孫殿起記二酉齋云：「徐春祐，江西人，於光緒四年開設。後易張質卿經理；又易傅青峻經理。先後經營四十餘年歇。近易鑒光閣字畫鋪。」同註 33，頁 115。

<sup>[38]</sup> 經香閣的紀錄闕如，孫殿起亦未記錄，目前僅能從唐魯孫〈北平書攤兒〉一文得知經香閣亦為琉璃廠舊書肆之一：「琉璃廠專賣講究版本的書叫舊書鋪，最有名，存書最多的有翰文齋、來黃閣、二酉堂、經香閣、汲古山房幾家。」見：唐魯孫，《老鄉親》（臺北：大地出版社，2000.2），頁 204。

<sup>[39]</sup> 沈津，〈王孝慈抄的戲曲書（三）〉，沈津：「書叢老蠹魚的 BLOG」，2007.10.25。上網日期：2008.10.20。網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4a788a01000c75.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4a788a01000c75.html)。

<sup>[40]</sup> 北京數文社編，《最近官紳履歷彙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2）（據 1920.7 北京數文社本影印），頁 98。其父王芝祥，字鐵珊，年五十四歲。前清舉人，曾任廣西桂平梧道署理廣西按察使布政使。見：北京數文社編，《最近官紳履歷彙錄》，頁 106。關於王立承的生平事蹟可參見：姜德明，《餘時書話·王孝慈與魯迅》（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2.9），頁 9-14，以及沈津，〈王孝慈抄的戲曲書〉系列文章。

<sup>[41]</sup> 關於魯迅、鄭振鐸編輯《北平箋譜》借王立承藏《十竹齋箋譜》影印出版之始末，詳見：鄭振鐸，〈劫中得書續記·《十竹齋箋譜》初集〉、〈復鐫《十竹齋箋譜》跋〉，同註 14，頁 303、388-389。

<sup>[42]</sup> 根據陳明遠的換算：「1936 年法幣 1 圓約合 2007 年人民幣 40 元」，見：氏著，《何以爲生：文人名人的經濟背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7.6），頁 223。由此可知，《縮春園傳奇》當時的書價換算成 2007 年的人民幣約為 2 萬元。而 30 年代一位大學教授的薪水約 300、400 元左右。

知，文友堂應該也是齊如山時常往來的書肆之一。<sup>[43]</sup>

上文曾述及齊如山於庚子拳亂和七七事變之後購得大量古籍，原因在於當時戰亂使得社會動盪不安，百業蕭條，再加上舊籍大量外流，讓舊書肆主人不得不降價求售，因此書價大跌，故齊如山能在庚子拳亂和七七事變之後購得許多圖書。因此，齊氏購書的紀錄，亦從另一個側面反映近代舊書業的興衰起伏與社會治亂之關係。<sup>[44]</sup>

總而言之，齊如山在這些文章中對於他蒐尋求訪通俗文藝史料文獻的管道、北京舊書肆的經營理念和策略、文人與書肆主人的來往情形、舊書肆所提供的文化沙龍之氛圍或是圖書館的功能，以及書肆主人的儒商風範均有著墨，有助於我們了解當時北京舊書業的樣貌，以及興衰起伏的變化，這不僅僅是書林掌故逸聞，亦為北京舊書業發展歷程的史料之一。從這些資料，不難體會這一代學人戮力蒐集與整理史料文獻的辛勞，有了他們的努力才奠定中國古代通俗文藝研究的基礎。

#### 四、齊如山藏書去向諸說釋疑

1948年12月齊氏離開大陸，倉促之間，他僅能攜帶部分善本小說戲曲書籍抵臺。日後，這些書籍大都入藏燕圖，關於齊氏舊藏入藏燕圖的經過，有兩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自齊氏在臺北去世後，藏書即由他的哲嗣（筆者按：即齊熙，1909-1995）價讓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sup>[45]</sup>；另一種說法是說齊氏「來臺後，經濟狀況，一直不算充裕——前面所談由北京帶來的那一批珍本書籍，後經友人介紹，賣到國外，如非不得已，齊是不肯這樣做的」。<sup>[46]</sup>這兩

<sup>[43]</sup> 孫殿起記文友堂云：「魏占良，字殿臣；魏占雲，字宇翹，冀縣人。於光緒八年設，多板本書。交易年深者，若雙鑾樓傅氏等。至民國□年，宇翹子文厚、侄文傳繼其業。經營六十餘年歇。近易實易商行及文祿堂。」又云：「廠甸路南書肆文友堂，……民國30年新正，該鋪房盡毀於火，嗣於原址重建。」上述引文同註33，頁119、120。關於文友堂與傅增湘的往來情形，參見：李小文、孫俊，〈文友堂藏傅增湘手札〉，《文獻》，2007：4（2007），頁153-160。

<sup>[44]</sup> 關於舊書業的興衰起伏與社會治亂之關係亦可參見：張中行，〈由舊書想起的〉，收入：蕭東發、楊承運編，《北大學者談讀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5），頁145-148。

<sup>[45]</sup> 同註2之2，頁203。

<sup>[46]</sup> 張大夏，〈我所知道的齊如山〉，《文藝復興》，68（1975.12），頁40。引文中的「友人」即是袁同禮（字守和），見：陳益源，〈丁日昌、齊如山與《紅樓夢》〉，載於：氏著，《古典小說與情色文學》（臺北：里仁書局，2001.9），頁310。

種說法最大的差異在於齊氏生前，還是去世之後將藏書售與燕圖。不過，沈津最近在其「書叢老蠹魚的BLOG」發表一系列關於王孝慈藏戲曲書的文章，其中便提到王孝慈部分藏書後歸齊如山所有，而對齊如山何時將藏書售與燕圖提出新的說法，他說：「1953年，齊氏所藏之戲曲小說價讓哈佛燕京圖書館，也算是有了一個很好的歸宿」<sup>[47]</sup>，1953年仍是齊氏在世的時候。結合上述諸說，齊氏藏書應該是在他生前經濟狀況不佳時，便售與燕京圖書館了。

至於齊如山大部分留在北京的藏書則逐漸散出。由於兩岸政治對立的因素，以及學術資訊的不流通，再加上《齊氏百舍齋收藏小說目錄》下落不明，使得學界無法得知齊氏小說戲曲藏書的狀況，對於其藏書的內容與去向更是眾說紛紜，隱晦難尋，加上缺乏檢索的管道，因此，齊氏舊藏小說戲曲存藏於中國的實際情況一直不為世人所知。

齊如山抵臺之後曾感慨地說：「舍下之存書，經過兩次極大的損失，此次在北平所存之書，將來結果如何？實不敢說」。<sup>[48]</sup>齊氏因時局的動盪不安而離開北京，也不得不擱下費數十年精力所蒐集的藏書。況且，由於當時兩岸政治情勢的對立，以及消息的隔絕封鎖，使他更無從得知家中藏書的聚散情形，這對一位藏書家來說無疑是十分掛心的。究竟其藏書流落何方？入藏何處？歷來的說法有二：

#### (一) 捐贈文化部，日後入藏北京圖書館和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

較早提到齊氏藏書去向的是吳曉鈴（1914-1995），他在〈哈佛大學所藏高陽齊氏百舍齋善本小說跋尾〉一文中說：「開國後，其藏書於燕市散出，大都歸戲曲研究院（今文化部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及北京圖書館。余亦獲曲籍數種」<sup>[49]</sup>；而張守謙〈通俗小說提要知見錄〉亦云：「其後齊氏書在京逐漸散出，而尤以戲曲書為多（孫楷第說似曾捐給某單位一部分），現戲曲研究所、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皆藏有其書。」<sup>[50]</sup>從他們的說法，我們可以發現齊氏舊藏大部分入藏北京圖書館與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不過，這二種說法頗多

[47] 同註 39。

[48] 同註 6，頁 4（總頁 2592）。

[49] 同註 2 之 1，頁 290。

[50] 同註 2 之 3。又《中國目錄學家辭典》亦有相同說法：「（齊如山）平生喜藏書……後多散出，歸戲曲研究所、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或臺灣、國外」，申暢、陳方平、霍桐山、王宏川編，《中國目錄學家辭典》（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12），頁 293-294。

隱晦。首先，「某單位」為何？是孫先生語焉不詳，還是張先生語帶保留？其次，齊如山離開大陸之後，是誰代表齊如山和齊家捐贈藏書？而捐贈藏書的時間與過程又是如何呢？換言之，這兩種說法雖然交待了齊氏藏書的去向，卻也留下許多謎團。

這些問題，或許透過齊如山之女齊香的說法可以獲得一些解答，她表示：<sup>[51]</sup> 解放之後，父親留下來的書和一些資料有一部分我們給了當時的文化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剩下的一些東西全部被燒掉了。我記得，那天我回家，看到家裡的所有書和資料都沒有了，我就問我妹妹這是怎麼回事，她告訴我所有的東西都被燒了。

此外，齊香在與陳益源的通信中，更明確地提到這批圖書是由齊夫人韓世喆女士（1880-？）與其姪兒齊熠（生平不詳）等人捐贈給文化部。<sup>[52]</sup>由此可知，在1949年之後，應是1950年代，齊家後人將齊如山的一部分藏書捐贈給文化部，這即是孫氏所云的「某單位」。1950年代正是中國私人藏書大批歸公的時期，對此，范鳳書曾云：<sup>[53]</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進行了一系列重大社會改革運動，特別是土地改革和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徹底摧毀了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加之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社會的思想觀也為之大變。自私佔有性也逐漸淡薄，影響於私家藏書者，十之八九都歸公處置，或自願，或隨勢一批批私藏交納公庫。

藏書家無論是自願捐贈，還是隨勢或是被迫繳納公庫，我們都可以發現政治力和意識型態的強力介入，影響了私人藏書的型態，改變私家藏書的方式，所以齊氏藏書在此時捐贈歸公是可以理解的。至於齊氏藏書在捐給文化部之後，其下落為何，入藏何處，我們則可以從1959年8月26日，北京圖書館在《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的序言中窺知一二：「十年來北京圖書館入藏的善本書籍數量激增，而質量也超過了從前任何時期。這些豐富的善本書籍的來源，除了中央文化部大批撥交和本館從各方面努力採購者外，還有兩個重要的來源。

<sup>[51]</sup> 申丹，〈〔關注〕戲劇家齊如山作品首次全面出版〉，《新京報》，2005.12.9。上網日期：2008.10.28。網址：<http://culture.thebeijingnews.com/0831/2005/12-09/015@093200.htm>。

<sup>[52]</sup> 陳益源據齊香女士於1995年12月24日函告，詳見同註46，頁311。

<sup>[53]</sup> 同註7，頁574。范氏更舉出此時近二百個私家藏書捐公的例子，參見頁574-588。

一、國內著名藏書家的捐獻。二、蘇聯及其他兄弟國家的贈還。」<sup>[54]</sup>文化部除了將古籍撥交給北京圖書館，本身也留存了一部分古籍，尤其是與戲曲文獻相關的資料，中國藝術研究院的藏書有一部分即來自原「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藝術事業管理區資料室藏書」。<sup>[55]</sup>經過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瞭解齊香的說法大致與吳氏和張氏的說法相同。

而齊氏剩下的藏書也和大部分的藏書家一樣，在十年文革中遭受前所未有的毀壞，沈津曾云：「由於歷史的演進，從四十年代以至六十年代，大陸社會的變革和歷次的政治運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蕩滌，私人收藏古書者百分之九十九都受到無情的衝擊。其中的小部分甚至連進入造紙廠的機會都沒有，就被紅衛兵付諸祝融了。」<sup>[56]</sup>顯見文革對於文化事業的破壞。此外，齊如山的外孫女賀寶善女士的說法亦值得留意，她說：「外公全部著作，未出版之底稿，多留在北京，文革以後，不少已不知所終。」<sup>[57]</sup>從她的語氣之中，也不難看出文革對於齊氏藏書實有莫大的損害，而她的說法正與齊香的說法相互呼應。

## (二) 藏書大部分仍留存齊氏後世子孫手中

有別於齊氏舊藏散出歸公或受到損毀的說法，《高陽縣志》另有主張：「齊如山藏書極豐，專門蒐集戲曲小說方面的書刊。……所藏書籍由其女齊唐保存，除少數散出外，餘者仍藏於北京舊宅，為現代收藏戲劇書刊之大家。」<sup>[58]</sup>此說顯然與上述諸說有很大的出入，齊氏舊藏若由其女齊唐保存，一來，齊香沒有理由不知道，也不應該有圖書捐公和受到文革破壞的說法；二來，這也與吳曉鈴和張守謙兩位的說法（齊氏藏書入藏北京圖書館和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有所矛盾。

到底這些說法孰是孰非呢？或許可以從一些研究者整理的成果來看。大塚

[54] 轉引自：徐雁，《中國舊書業百年》，頁 555。

[55] 余力，〈書海尋《夢》錄（三）——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藏珍稀紅學文獻識錄〉，《紅樓夢學刊》，2005：1，頁 227。而作者於文中著錄了中國藝術研究院藏齊如山舊藏《新鐫全部綉像紅樓夢》，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萃文書屋活字本，頁 228-229。

[56] 潘美月、沈津編，《中國大陸古籍存藏概況》（臺北：國立編譯館，2002.12），第一章「緒論」，該章由沈津撰寫，頁 38。關於文化大革命對於藏書家的衝擊亦可參見：范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頁 588-593；徐雁，《中國舊書業百年》，頁 654-704。

[57] 同註 8，頁 63。

[58] 高陽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合編，《高陽縣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8），頁 1009-1010。

秀高所編的《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詳盡地著錄了各種不同的版本和藏所，同時也記錄了小說的舊藏者。其中關於齊如山舊藏小說的紀錄，在北京圖書館的便有72種（不同版本不計），而在天津圖書館的也有2種。<sup>[59]</sup>這僅是目前已知的部分，不難想像齊氏舊藏還有一大部分的去向不為人知。

此外，我們也可以從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的網站上獲得一些訊息，在其圖書館「概述」中提到：「館藏特色突出在戲曲文獻和戲曲實物資料的收藏。戲曲資料主要包括20世紀50年代以來梅蘭芳（1894-1961）、程硯秋（1904-1958）、齊如山等名家捐贈，還有本院研科人員多年采風的積累和研究、考察報告的手稿。」<sup>[60]</sup>在該館的介紹中明確提到齊如山舊藏入藏於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而這些圖書的來源，即如前述，是齊家在1950年代捐贈給文化部，而再由文化部撥交給北京圖書館和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這與齊香、吳曉鈴和張守謙的說法相符。

從齊氏後代的說法，和研究者整理的成果，以及網路上的訊息，我們可以確信《高陽縣志》的說法有誤。齊如山舊藏早已流散四方，而非大部分仍留存齊氏後世子孫手中。如此說來，齊氏舊藏書籍、著作應於1949年10月之後逐漸散出或受到損毀，而主要入藏的機構是中國國家圖書館（原北京圖書館），以及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原戲曲研究所），少數流入其他圖書館，或為私人所有，甚至是流向古籍圖書拍賣市場之中<sup>[61]</sup>，如今想要一窺齊氏舊藏的全貌已非易事。或許，《齊氏百舍齋收藏小說目錄》與《齊氏百舍齋收存戲曲目錄》尚存於世，將來仍待研究者更進一步的尋訪，發掘更多與齊如山藏書有關的訊息。

[59] 同註2之5，頁217-227。

[60] 「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概述』介紹」。上網日期：2008.10.30。網址：[http://www.zgysyjy.org.cn/newart/lanmuye.jsp?class\\_id=18](http://www.zgysyjy.org.cn/newart/lanmuye.jsp?class_id=18)。

[61] 北京海王村拍賣有限責任公司曾拍賣一部齊如山舊藏《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集解》一百三十卷，清乾隆十三年（1748）武英殿刊巾箱本，上鈐有「齊林玉世世子孫永寶用」、「陳氏芸閣」、「鐵厓真賞」等印，開拍時間為2007.5.13。上網日期：2008.10.31。網址：<http://www.kongfz.com/auction/yuzhan.php?id=19547>。該書最後以人民幣101,200元成交，見「中國書店·2007年春季書刊資料拍賣會」。上網日期：2008.10.31。網址：[http://www.zgsd.net/channel2-p\\_65157.shtml](http://www.zgsd.net/channel2-p_65157.shtml)。

## 五、結語

蘇精在撰寫藏書家故實的過程中，發現近代關於藏書家故實的紀錄，幾乎僅止於清末，而清末民初或是民國以來的藏書家則往往不見相關圖書的敘述。他接著提到：<sup>[62]</sup>

數十年來由於戰禍連結，中華典籍的浩劫更甚於前，加上社會變遷導致私人藏書事業的急遽式微，都使得近代藏書及藏書家的文獻亡佚極多，再不及時蒐羅保存，以後將更難著手，於是我決定以卒於民國元年之後的藏書家為對象，撰介其家世生平、藏書聚散經過、所藏內容特點、編印校勘或撰述、及與藏書有關的行實。

因此，他發表一系列關於近代藏書家的文章，最後結集成《近代藏書三十家》一書，該書深刻鮮明地勾勒出藏書家的藏書概況，增進學界對藏書家藏書活動的了解，實為該領域的重要著作之一。<sup>[63]</sup>然而，由於種種因素的限制與影響，目前尚有許多藏書家以及他們的藏書未能獲得關注，也因為如此，學界對他們的藏書之聚散過程、內容特色，以及去向不甚明瞭，留下了不少亟待解決的問題，而其中一位藏書家便是本文所探討的對象——齊如山。

齊氏舊藏書籍以小說戲曲為大宗，現今流散四方，其中又以中國國家圖書館（原北京圖書館）和燕圖兩者典藏最多。由於未有研究者針對齊如山藏書的聚散情形，以及藏書內容多作說明。因此，本文試圖先勾勒出齊如山及齊家藏書數度聚散的軌跡、他平日訪書藏書的管道與概況，以及他對北京舊書業的紀錄。接著，討論關於齊氏藏書去向的諸種說法，釐清其中的矛盾和異同。這樣的討論當有助於彌補學界長久以來，對齊如山藏書活動不甚明白的狀況。探討藏書家藏書之購藏、流傳，乃至於散失的過程，可以增進我們對於藏書家藏書概況和內容的了解，讓學界更準確地評量藏書家的貢獻及其藏書的學術價值。同時，也讓我們抉發出藏書家與藏書活動背後那廣闊深刻的社會背景與時代意義，相信這對於往後研究深度的擴展是有相當幫助的。

<sup>[62]</sup> 蘇精，《近代藏書三十家·自序》（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3.9），頁1。

<sup>[63]</sup> 范鳳書，〈私人藏書史研究中的雙璧——評《宋代藏書家考》和《近代藏書三十家》〉，收入：氏著，《私家藏書風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6），頁195-196。

## 致 謝

本文承蒙審查委員惠賜審查意見，使筆者得以釐清相關問題，讓本文的論點更爲周全，謹此致謝。

## 參考文獻

- 大塚秀高。《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東京：汲古書院，1987.5）。
- 「中國書店·2007年春季書刊資料拍賣會」。上網日期：2008.10.31。網址：[http://www.zgsd.net/channel2-p\\_65157.shtml](http://www.zgsd.net/channel2-p_65157.shtml)
- 「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概述』介紹」。上網日期：2008.10.30。網址：[http://www.zgysyjj.org.cn/newart/lanmuye.jsp?class\\_id=18](http://www.zgysyjj.org.cn/newart/lanmuye.jsp?class_id=18)。
- 北京敷文社編。《最近官紳履歷彙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2）（據1920.7北京敷文社本影印）。
- 申丹。〈〔關注〕戲劇家齊如山作品首次全面出版〉，《新京報》，2005.12.9。上網日期：2008.10.28。網址：<http://culture.thebeijingnews.com/0831/2005/12-09/015@093200.htm>。
- 申暢、陳方平、霍桐山、王宏川編。《中國目錄學家辭典》（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12）。
- 任中奇。〈古書價格漫談〉，《藏書家》，2（2000.6），頁121-130。
- 余力。〈書海尋《夢》錄（三）——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藏珍稀紅學文獻識錄〉，《紅樓夢學刊》，2005：1（2005），頁227-241。
- 吳曉鈴。〈哈佛大學所藏高陽齊氏百舍齋善本小說跋尾〉，《明清小說論叢》，1（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4.5），頁289-320。
- 李小文、孫俊。〈文友堂藏傅增湘手札〉，《文獻》，2007：4（2007），頁153-160。
- 李雪梅。《中國近代藏書文化》（北京：現代出版社，1999.1）。
- 沈津。〈王孝慈抄的戲曲書（三）〉，沈津：「書叢老蠹魚的BLOG」，2007.10.25。上網日期：2008.10.20，網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4a788a01000c75.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4a788a01000c75.html)。
- 沈津。《書城風弦錄——沈津讀書筆記》（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10）。
- 姜德明。《餘時書話》（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2.9）。
- 胡金兆。《百年琉璃廠》（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8）。
- 范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7）。
- 范鳳書。《私家藏書風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6）。
- 倫明著、雷夢水校。《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9）。

- 唐魯孫。《老鄉親》（臺北：大地出版社，2000.2）。
- 孫殿起輯。《琉璃廠小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9）。
- 孫殿起錄。《叢書目錄拾遺》（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2）。
- 徐雁。《中國舊書業百年》（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5）。
- 高陽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高陽縣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8）。
- 張大夏。〈我所知道的齊如山〉，《文藝復興》，68（1975.12），頁34-40。
- 張守謙。〈通俗小說提要知見錄〉，《明清小說研究》，6（1987.12），頁510-538。
- 陳明遠。《何以爲生：文人名人的經濟背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7.6）。
- 陳益源。《古典小說與情色文學》（臺北：里仁書局，2001.9）。
- 陳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1）。
- 傅惜華編纂。《北平國劇學會圖書館書目》（北平：北平國劇學會，1935.4）。
- 賀寶善。《思齊閣憶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10）。
- 黃宗羲。《南雷文定》四部備要本（臺北：臺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1.6）。
- 齊如山。《齊如山回憶錄》，《齊如山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12）。
- 齊如山編纂。《北平國劇學會陳列館目錄》（北平：北平國劇學會，1935.6）。
- 「齊如山舊藏《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集解》拍賣資訊」。上網日期：2008.10.31。網址：<http://www.kongfz.com/auction/yuzhan.php?id=19547>。
- 潘美月、沈津編。《中國大陸古籍存藏概況》（臺北：國立編譯館，2002.12）。
- 鄭振鐸。《西諦書話》2版（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5）。
- 蕭東發、楊承運編。《北大學者談讀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5）。
- 羅景文。「齊如山〈小說勾陳〉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4）。
- 蘇精。《近代藏書三十家》（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3.9）。

# A Study of the Gathering-scattering of Qi Rushan's Book Collection

Ching-wen Luo

## Abstract

Qi Rushan (1875-1962) was a collection of fictions and dramas. His collections were mainly scattered over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and Yenching Library of Harvard University. Because the academia makes nothing of the whereabouts and gathering-scattering of fictions and dramas owned by Qi Rushan, this paper elucidates the track of gathering-scattering of books owned by Qi Rushan. At the same time, this thesis introduces the Beijing's used book stores that Qi Rushan recorded. This thesis finally studies the conflicting versions of Qi Rushan's book collection.

---

**Keywords (關鍵詞) :** Qi Rushan ; Bai She Zhai ; Book Collector ; Fictions and Operas ; Gathering-scattering of Book Collection

齊如山 ; 百舍齋 ; 藏書家 ; 小說戲曲 ; 藏書聚散

Ching-wen Luo :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E-mail: jingwen123@pchome.com.tw